



【文学研究】

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琴知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从韩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个别类型入手,分析韩国人在古代是如何认识、描绘“中国”这个他者,并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及如此创作的意义,最终尝试在东亚文学的多种发展脉络中,把握韩国文学的本质及地位。高丽与朝鲜时代,以“中国”为素材和背景的作品非常多。一些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出使路上所见的风景名胜为素材进行创作;一些传奇和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中国,出场人物的国籍也均为中国。这些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在文人的作品中。通过与来访朝鲜的中国使臣的会面,通过去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访问记录,通过阅览中国书籍和士大夫收藏的绘画,可以探寻中国历史和文化空间。一般而言,这些以中国为描写对象和抒情对象的诗文作品,表面描绘中国,实则隐晦地表达或呈现了韩国本民族自身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及命运。

关键词:韩国古典文学;中国;韩国文人与中国;作品中的素材与背景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14)01-0127-08

一、序言

世上不存在完满自足的独特文化。即使是凭借本民族独特的特点而形成的灿烂民族文学,也是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最终将其融合于本民族文学之中。韩国的汉文学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了世界的属性。韩国的汉文学用汉文创作而成,而且受到了以中华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影响,正是基于这两点,韩国汉文学的相当部分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文学、东亚文学的共同特点。典型的实例就是新罗作品,它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三国作品主流,但如今并不在韩国,而被收录到了中国的《全唐诗》《全唐文》等文献当中。这可能是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原因,新罗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附属于中国的缘故。在诸多汉籍文献当中,中国诗歌和小说文本成为韩国文人吸收中国知识的一个重要源泉。

然而这并不是说,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其作品内容和世界观就会被完全中国化。韩国创作的汉文

收稿日期:2013-11-11

作者简介:琴知雅,女,韩国人,韩国延世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中韩比较文学及文献学研究。

学不同于中国文学,它仍然具有浓厚的韩国特点,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韩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对融合于韩国文学的“中国”世界及其特点进行考察,是一个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察韩国文学里究竟吸收了多少外部元素,而且还要具体考察韩国文学中的哪些内容与外部文学进行了交流、如何交流以及创造出了怎样的多样性。

为此,本文将从朝鲜时期文人的海外体验、中国绘画中的想象空间、作为作品背景的“中国”这样三个角度入手,通过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作品,简要阐明“中国”这一韩国境外国土的空间概念是怎样融入到韩国古代文献当中的,同时略述传统时代朝鲜文人的思维。以往也有学者对上述个别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本文主要欲以“韩国文人和中国”这个大题目将以往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所以首先点明:本文中所说的“古典文学”,是指包括韩国汉文学和古小说在内的一个概念范畴。

二、韩国传统时代的文人和中国

(一) 文人的海外体验和中国

李齐贤(1288-1367)在中国元朝度过了10个春秋(从21岁到36岁),并创作了许多诗篇。李齐贤出生于小地方,却有机会放眼世界。他多次踏上横贯中国大陆的旅途,亲眼目睹了大陆的壮丽山河,亲身验证了华夏的悠久历史。其间途经燕京时作诗于万卷堂,并与当时中国的代表性文人赵孟頫(1254-1322)、虞集(1272-1348)等有往来交流;他用诗歌描述了这一系列的旅程。他的诗篇不仅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所见所闻,还融入了一定的思想与情感。在他的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异国风情。

1316年李齐贤奉命出使四川省峨眉山降香。元朝皇帝每年都定期亲临名山大川降香,但实际上都是由使臣代行的。李齐贤被选为元朝使臣的过程并不为后人所知,但据推断可能是忠宣王以及出入万卷堂的翰林学士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往返峨眉山途中李齐贤共写下了18首诗歌并将这些诗汇总,编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西征录》。后来他的后代将其诗歌和散文全部汇总,编成了《益斋乱稿》。其中第一、二卷主要收录的是游历中国时创作的诗歌。先来看《八月十七日方舟向峨眉山》(《益斋乱稿》卷一):

锦江江上白云秋,唱彻骊驹下酒楼。一片红旗风闪闪,数声柔橹水悠悠。
雨催寒犊归渔店,波送轻鸥近客舟。谁谓书生多不遇,每因王事饱清游^{[1](丛刊2)}。

1316年9月2日(阴历8月15日),李齐贤到达成都。小憩两日之后,于9月4日(阴历8月17日)乘船离开,历时7天到达峨眉山。第二句中的“骊驹”是上古时代的离别曲,但即便是离别之时,诗人也依旧兴致盎然。第三、四句的描写非常逼真。第五、六句描写乘船途中看到岸边悠闲的风景。从第七、八句中可以看到即便身负繁重公务但依旧信心百倍的旅行家形象。再看下面这首《登峨眉山》(《益斋乱稿》卷一):

苍云浮地面,白日转山腰。万像归无极,长空自寂寥^{[1](丛刊2)}。

名山峨眉山是此次旅行的目的地。峨眉山是中国的佛教圣地,山内供奉着普贤菩萨。第一、二句以写实的手法对比了两种景象,即从地面升起的苍云和围绕山腰的“佛光”。第三、四句以绝对的境界象征无极,读者可以感受到瞬间的超越。李齐贤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的第一位读者是出入万卷堂的翰林学士、高丽末期的文臣李穡(1328-1396),他曾说此诗一度“脍炙人口”。

高丽末期朝鲜初期的士大夫文人金九容(1338-1384)是韩国历史上罕见的饱受磨难的文人。1384年(禡王10年,明太祖17年)1月15日金九容奉王命任高丽王朝的行礼使出使辽东,因惹怒明太祖而被押送至首都南京。在被押送至流放地大理的途中,在泸州永宁县江门站病逝,时年47岁。需要

注意的是,他被流放的地方不是韩国境内的某个地方,而是被明朝的皇帝流放到了中国境内极为险峻的西南地区的边境地带。金九容被流放是高丽末期复杂又不稳定的对明外交政策的结果,所以从他的诗篇和他作诗的周边环境可以读出当时的外交状况。被流放至异国他乡流放地时的那种乡愁、孤独和悲剧性在他的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且要比任何一首诗都更为浓厚。他的诗还反映了一个人在不可避免的不公平命运面前所要承受的痛苦、内心的矛盾以及愿望等非常复杂的情感。其文集《惕若斋学吟集》卷下中收录了五联诗。下面看一下其五联诗中的两首:

《将赴云南沂江而上寓怀录呈给事中两镇抚三位官人》(其二)

大理城何在,三韩地渐遥。江山人面瘦,风月客魂销。
得酒排愁闷,裁诗遣寂寥。圣恩流几日,回首望云霄^{[1](丛刊6)}。

《将赴云南沂江而上寓怀录呈给事中两镇抚三位官人》(其四)

臣罪当诛戮,天王益圣明。雷霆威已霁,雨露泽难名。
梦绕胥馀国,身流大理城。华夷方混一,何地不安生^{[1](丛刊6)}。

从诗题中可以看出此诗是在即将启程前往云南之前,写给给事中两镇抚的诗。从第一首诗里可以感受到即将踏上被流放至云南之程的金九容的心情。金九容的流放地大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是中国境内极为偏僻的地区,遍布高山峻岭。前往云南的路途艰险、遥远,而且之前作为使臣前往辽东之行,以及被意外地押送至南京的经历已经让金九容身心极度疲惫,摆脱不断翻涌而至的担忧、烦恼和孤独的办法只有饮酒和作诗。第八句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其满脸愁容地仰望密布密云的天空而叹息不已的形象。第二首诗将对皇帝的感恩之心比喻为雨露对万物的恩泽,进而赞扬了皇帝促成中华和东夷的统一之恩泽。但是在第五、六句中诗人却描写到“梦绕胥馀国(胥馀是箕子的名字,即指高丽——笔者注),身流大理城”,体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和对流放地的恐惧不安。

李廷龟(1564-1635)自1595年任冬至使书暇官出使明朝以来,共到过北京五次。其中第二次、第五次出使时分别写下了《游千山记》(《月沙集》卷三十八)^{[1](丛刊69-70)}和《游医巫闾山记》(《月沙集》卷三十八)^{[1](丛刊69-70)}两文。李廷龟远望千山写道“闻千山在西,医巫闾在广宁北,角山寺在山海关城曲之口高顶,俱称奇绝,而去路牖十里,或三十里二十里,迂且险,官程不获自由,唯望见寄想而已。”对于医巫闾山,他写道“沿途诸胜,皆昔年所饫观,独医巫闾是北镇名山,常有意一见,而余老矣。倦于行役,时又苦寒,不果焉。”

由于历代使团随行人员的个人资料都是非公开的,所以他们创作的有关首阳山的诗歌也就没有被流传下来。使臣们为什么一定要路过并非正规路线的首阳山,并准备好蕨菜到夷齐庙祭祀呢?1608年作为冬至使书暇官出使明朝的崔颢(1563-1640)写下了《朝天日录》,以日记形式记录下了每日行程中发生的事件。在他的燕行录中,首阳山不仅是出使的行经地之一,还有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医巫闾山和千山的一点,就是它还是忠节的象征。文集中也收录了有关首阳山的诗,这些诗描述了横渡滦河到达首阳山的这段旅程和首阳山的来历与面貌“西指滦河岸,孤峰号首阳。山因高义重,水共大名长。万古扶天地,千秋振纪纲。行人皆仰止,拳石亦挈芳。”^{[1](丛刊67)}

诗的前半部首先介绍了滦河和首阳山,之后将两者分别与“义理”和“大名”联系起来。义理和大名是客观存在的滦河和首阳山所包含的象征意义。伯夷和叔齐舍命坚持的是“义理”,因此在历史上留得了“大名”。由此看来,首阳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而且已变成体现朝鲜使臣崔颢的意念的空间。在从汉阳到北京的几次燕行中,像首阳山这样被彻彻底底地寓意为“忠节”的地方可谓独一无二。因伯夷和叔齐对殷商的忠诚而赋予首阳山的这种“忠节”形象已被朝鲜的知识阶层看成是保证“行为和意识

正当性”的符号。特别是对于经历了壬、丙两乱之后的朝鲜王朝,首阳山的象征意义已超越了原来的忠节的含义,而被扩大为“对明义理”或“尊周义理”这一概念。而且在清朝入关以后,首阳山所代表的内涵更成为自称为小中华的朝鲜在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维护自尊意识的最后的堡垒。此外,对明朝的灭亡痛心不已、慨叹朝鲜命运的金锡胄(1634-1684)的诗作《燕京明朝灭亡感怀》(《息庵遗稿》卷七《捣椒录》下)也同样以中国为背景:

英皇往迹足伤怜,欲说崇禎更怆然。社稷于公真一介,乾坤申岁是何年。

煤山阁毁惟衰草,天寿陵空只冷烟。堪恨绛衣无继鹭,几时此藁起丛填^[1](丛刊145)。

朝鲜和中国明王朝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共同经历了壬、丙两乱,是命运休戚相关的友好邻邦。到明朝崇禎皇帝时明朝灭亡,与此同时朝鲜也陷入了屈辱的束缚中。金锡胄在逗留于明朝古都燕京期间,感慨万分地写下了这首诗。

如前所述,韩国古典文学中既有吟唱于长期居住在中国或多次的使者之行中所感受到的异国风情的诗篇,如高丽李齐贤和朝鲜李廷龟的诗作,也有的诗篇表面是在以中国作为描写和抒情的对象,却不是为写中国而写中国,而是在暗中映衬韩国民族的思想、情感、意志和命运,如高丽金九容和朝鲜崔暱、金锡胄的诗作。此外还有申纬(1769-1845),也一样借写中国来写朝鲜。他的《警修堂集》卷二《奏请行卷》里收录了自他出使北京那年(1812年7月)到第二年(1813年2月)期间所写的89首古今体诗。这些诗主要按顺序记录了从辽东至北京途中的见闻、在北京的体验和回程中的所见所闻。所以《奏请行卷》中所收录的作品是根据申纬的观点对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的记录,也是他在出使北京途中与文人们的交流史,同时也堪称为一本记录途中所见名胜地的“燕行录”。如其中的一首《会宁岭》:

匝地群峰忙自退,全辽岭阨此为雄。天垂縹白萦青外,秋入丹砂点漆中。

峡斗虎狼霾短景,城昏鹤鹑舞回风。云层笑语时相失,山半荒祠一会同^[2](1册,P11)。

申纬在附记中写道:“古今人诗,有不谋而同者。余燕行时,会宁岭得一句曰‘天垂縹白萦青外,秋入丹砂点漆中’,此以为佳,后阅陆放翁集有曰‘天垂縹白萦青外,人在骇红忿缘中。’后人必曰剽窃,而余实偶然不谋而同也。”朝鲜时代的诗歌往往会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而申纬似乎也已意识到了中国的拟古风潮,所以便以“不谋而同”一语强调自己诗歌的独创性。尽管以中国为描写和抒情的对象,但诗中却暗暗地体现出了朝鲜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申纬评论中国诗歌时的美学标准基本上源自中国的,但其中也反映了自己的美学观。

(二) 绘画中的想象空间

一般来讲,文人们如果没有直接到过游览胜地,就会通过书、画、屏风等来欣赏名胜地的风貌。17世纪以后,朝鲜文人画家们购买和收藏南宗文人画的风潮促使出现临摹及效仿的现象,而临摹和效仿只有在多看中国画、多读有关中国绘画史的文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由此可见当时文人画家们的确具有很高的水平。

高丽与朝鲜人的绘画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中国的名胜地。“潇湘八景”就是一例。“潇湘八景”是指潇江和湘江汇合之处的八大美景,即山市晴岚、渔村夕照、潇湘夜雨、远浦归帆、烟寺晚钟、洞庭秋月、平沙落雁、江天暮雪。“潇湘八景”是位于中国湖南省的一个实际存在的景观,在宋代形成新的艺术之后,它作为文化中心地的一道绝景,成为中世纪汉文化圈在文化领域内公认的理想景色。但对很多高丽和朝鲜的文人来说却只能是梦中游地,而不曾实地游历。因此在当时,他们对于“潇湘八景”只能借助于绘画和诗歌来描述,遂出现了很多融入有欣赏阶层思想情感、展现“潇湘八景”多种风貌的诗歌和绘画。高丽明宗手中的“潇湘八景”被文臣们吟咏,还曾让画家李光弼依此作画,可惜没有流传

下来。据说创作“潇湘八景”诗篇的众多文臣中以李仁老(1152-1220)为佳。兹录其《洞庭秋月》:

云端滟滟黄金饼,霜后溶溶碧玉涛。欲识夜深风露重,倚船渔父一肩高。

第一、二句描写了挂在云端的明月和映在水面上的月光。黄金、碧玉等宝石的比喻让人感受到月光、水光的玲珑剔透。第三、四句里明月高挂的夜晚渔夫兴致昂昂的姿态表现出了赏月时的美趣和对自然景观的深刻感鸣。朝鲜建国之后,安平大君(1418-1453)曾将宋朝宁宗的潇湘八景诗展示出来,召集画家和集贤殿的学士们编纂了以潇湘八景为主题的诗画册《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这本诗画册的卷首便收录了李仁老的潇湘八景诗。

下面从徐居正(1420-1488)所写的汉诗《题朴校理樾家藏小画》(《四佳集》卷五)里可以看出在朝鲜初期展现庐山风景的画卷已小有盛行:

庐山三百重,苍翠晴氤氲。晓来风雨声,流出满溪云^{[1](丛刊11)}。

这首诗是徐居正看到收藏在校理朴樾家中的画后写下的题画诗。从诗题《庐山风雨图》来看,朴樾家的收藏画画的应该是风雨中的庐山。诗题中称“小画”,可见此画不大。至于这幅画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作品,现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画所画的是美丽的庐山。朝鲜初期的士大夫朴樾将其收藏于家中。徐居正据此用汉诗再现了凌晨时分被雨后溪谷间升起的云雾所环绕的庐山的美景。通过这幅画,通过知识阶层的传播,中国的庐山美景被人们知晓。此外,朝鲜初期可能已开始流行描绘与庐山相关的故事的绘画。如根据故事成语“虎溪三笑”而成的画作《虎溪三笑图》,既有从中国传入朝鲜的,也有由朝鲜人自己画的。朴彭年(1417-1456)所写的《三笑图序》(《朴先生遗稿》卷一)是为中国画家作品所写的序文^{[1](丛刊9)}。序文中指出,宋朝画家龙眠居士李公麟(1049-1106)所画的三笑图在朝鲜初期被松雪轩权宏由中国买入后又转到匪懈堂安平大君手中,自己看到这幅画后写下了序文。姜熙孟的《三笑图记》(《私淑斋集》卷八)是为朝鲜人的作品写的记文^{[1](丛刊12)}。记文中说方外友即他的僧侣朋友一庵专公雇佣画工画下了三笑图,并请他为之写记。

休得臣(1604-1684)的《终南丛志》中记有这样一段故事:明宗得一画,但不解画中之物,于是分与大臣们传看,却无人能答,此时,郑士龙上前禀此画为“杭州西湖图”,他一一指出画中所画的灵隐寺、涌金门、苏堤等名胜地和古孤寺钱镠的地基、赵嘏的私塾、林逋的居住地等,并同时作了栩栩如生的说明。另外,他还作了一首《杭州图诗》呈献给皇上^[3]。

这说明远远早于壬辰倭乱之时,文人知识阶层就已对浙江地区尤其是杭州地区的风光和历史人物抱有很大的憧憬。历代诸家的文集中都反映了当时很盛行将“杭州图”或“西湖图”挂于墙上的现象,并且当时也出现了不少表现对西湖地区憧憬和羡慕之情的作品^{[4](P124-125)}。

实景山水画家郑叡(1676-1759)虽以唐诗为画题,却试图将诗中的形象反映在比较写实的朝鲜景致当中。文人画家申纬(1769-1845)在临摹中国的山水画时也同样避免完全抄袭^{[5](P287)}。申纬的这种作画态度可以从他在模仿元朝的黄公望(1269-1354)和宋朝的米芾(1051-1107)所画的《访戴图》上所写的“黄不黄米不米”一语中看出。《访戴图》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王羲之之子书法家王献之(?-388)在飘雪的某日夜晚,本想去拜访以善弹玄鹤琴而闻名的戴逵,但在途中忽然感到很满足,便转身返回。可能正因此故,画图中在江岸的两边分别画上了草房,并在之间画上了一艘渡船。

《初雪酒后自题黄不黄米不米帧侧》

日脚凝永风努呼,楼阴山黛合模糊。梦回酒气全消席,人静香烟尚在炉。

一点斜飞融暖砚,千声骤至变寒芦。偶然水墨参黄米,蓦地神游访戴图^{[2](4册,P1751)}。

从第一、二句中可以感受到用模糊的淡墨描画出的山峦和白色画纸的余白之间所反衬出的严冬的

荒凉。第三句到第六句描绘了在作画之前,画家在室内的暖气中保持着冷静揣摩创作技巧的心态。在最后两句中,作者点明此画虽糅合了黄公望和米芾的文人画法,却体现了某种灵气,以此来强调此画是自己的独创而非完全效仿黄、米两家。可见朝鲜文人从最初起在效仿中国人描绘中国山川的过程中,就已在强调自己的独创意识,这和之前谈到的在作诗时强调自己诗歌的意境是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同”而非抄袭的独创意识是一致的。

丁若镛(1762-1836)认为,中国的诗风随着中国的时代有所改变,而朝鲜的诗风也应该根据朝鲜的时代而改变。他在晚年时节(1832年)所作的《仪人一快事牖首效香山体》(《与犹堂全书》一)的第五首中宣言,不追随中国文坛的变化而将创作“朝鲜诗”:

仪人一快事,纵笔写狂词。竟病不必拘,推敲不必迟。兴到即运意,意到即写之。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卿当用卿法,迂哉议者谁。区区格与肿,远人何得知。凌凌李攀龙,嘲我为东夷。袁尤槌雪楼,海内无异辞。背有挟弹子,奚暇枯蝉窥。我慕山石句,恐受妩郎嗤。焉能饰凄惜,辛苦断肠为。穀橘各殊味,嗜好唯其宜。

当然这里所说的“朝鲜风”的含义并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新的作诗倾向是要创作出符合朝鲜人的思维和情感的文学。

朝鲜人究竟能创作出多少符合他们的思维和情感、体现他们性情的诗?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朝鲜收藏家们所收藏的中国画籍中的山水画,不管是何种样式,毕竟还是影响了同时代的朝鲜画家并被融合到了其作品当中。事实上,以往的见解过于强调朝鲜内在的发展论,而并没有客观地看清朝鲜画作为东亚绘画圈的一分子是在相互联系中有所跃进的这一事实。但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认可朝鲜画家在临摹过程中,为创造出区别于中国而属于朝鲜的独创性画作所作出的努力。

(三) 作品中的背景——中国

衡山和洞庭湖为何会成为《九云梦》的背景?中国五岳之南岳衡山之所以成为金万重(1637-1692)小说《九云梦》的背景,是因为山内建有很多佛教寺庙。《九云梦》开篇便介绍了天下名山:

天下名山,曰有五焉。东曰东岳即泰山,西曰西岳即华山,南曰南岳即衡山,北曰北岳即恒山,中央之山曰中岳即嵩山。此所谓五岳也。五岳之中,惟衡山距中土最远,九疑之山在其南,洞庭之湖经其北,湘江之水环其三面……^{[6](卷之一)}

事实上衡山与其他东西北三岳相比要偏远很多,且也很可能是远离城邑的。小说中所提到的衡山、洞庭湖、九夷山、湘江实际上都相距甚远。但金万重却以宏观的视角描述了衡山的周边,将它们放到了一个彼此非常临近的空间关系里。另外五大山峰中的莲花峰实名为“芙蓉峰”,金万重将其更名为“莲花峰”,很可能是想强调和六观大师所建的寺庙之间的关联,从而渲染佛教的氛围。而选择相对远离中原的衡山为小说的背景,则有可能是表达其想远离红尘、静心修道的意图。这些都说明《九云梦》虽借中国为背景,但其中却有不少虚构。《九云梦》中接着又引用了杜甫诗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四句,借此来吟咏此地之神妙,称赞莲花峰(实为芙蓉峰——笔者注)道场为南部地区之首: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

衡山充满韵味的云雾足以和黄山相媲美。但由于其山势险峻,山脉绵延数千米,所以又被称为七十二峰,其中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粟五峰最为有名。另外,环绕衡山的湘水拥有丰富的文学素材,可以说是孕育中国神话和文学的摇篮之一。

金万重(1637-1692)的《谢氏南征记》也是借中国的时空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众所周知,《谢氏南征记》是作者于肃宗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689-1692)在流放地创作的“目的小说”,其旨在改变肃

宗的想法,以帮助被废黜的仁显王后回宫复位。虽然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个家庭的妻妾的故事,但其中所要影射的却是国家大事,有必要从人伦的本质上来重新品味。

该小说中的时代背景为明朝后期,主人公为明朝传统的名门士族的后代。但作者对作为小说背景的中国南方的地理实在缺乏了解。另外作者对与所经过地区相关的中国文学知识也掌握甚少,所以小说中的空间背景只能虚构。如作品中提到的男主人公刘延寿居住的地方金陵顺天府(但是大明嘉靖年间的首府已不是金陵(南京)而是北京。值得注意的是,韩文版中的“金陵顺天府”在汉文版中被改成了“北京顺天府”——笔者注)就是一例。南行的女主人公谢氏为“新城谢给事之处子”,由此可知她的家在新城县。谢氏由北京出发前往成都刘家的祖坟,从地图上来看是一段很远的路途。从成都乘船前往长沙的途中所经过的很多地方都是包含着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要素的名胜地,但作品里都没有提及。只是说因遇风浪而将船靠岸,上岸寻一人家休息片刻后便离去。接着便顺着洞庭湖水来到了岳阳楼,从这里又经过了黄陵庙(小说里将从岳阳楼到黄陵庙描述得很近,而事实上两地相距100公里——笔者注),最后到达了目的地洞庭湖的君山。

那么,作为朝鲜人,他又为什么要以中国为小说的背景呢?从《谢氏南征记》的内容来看,可以说这种安排是一种讽刺性的迂回手法,用来暗讽当时的历史事件。用彦文体(韩文)创作的这部小说后来由休春泽翻译成汉语传到中国,因而它也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中国小说。直至今日还有部分中国学者将描写中国的韩国汉文小说(或由国文小说翻译成汉语的汉文小说)误认为是“至今为止未曾发现的中国古代小说”,《谢氏南征记》就曾引起过这样的误会。

如上所述,朝鲜时期有不少文学作品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有些作品不仅以中国为小说的背景,连小说人物也是中国人。这些作品在韩国汉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是首屈一指的。历代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涌入韩国的中国文学作品为韩国创作出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结 语

朝鲜时期有不少文学作品以“中国”为题材和背景。部分抒情诗和叙景诗以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出使途中所见的风光和名胜地为题材;部分传奇和小说以中国为背景,人物的籍贯也为中国。金陵、成都、峨眉山、泰山、庐山、洞庭湖、西湖、湘江、岳阳楼等众多中国名胜已深深印记在朝鲜时期文人的头脑中。这些以“中国”为题材和背景的作品在韩国汉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世界任何国家以外国为题材的作品的比例都不会超过它。

有关“中国”的这些内容通过各种途径融合到了文人的作品当中。当时的朝鲜文人主要是通过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们的交流,通过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们所写下的实地纪行录,通过阅读中国的书籍和士大夫们收藏的绘画接触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空间。以中国为描写抒情题材的作品一般都不是在写中国,而是借写中国来暗中表达或呈现韩民族的思想、情感、意志和命运。以小说为例,作为为实现肃宗时期的政治社会目的而创作的“目的小说”,尽管其中对中国的地理空间的了解多少有些偏失,但正如休台俊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要借用中国的事物来讽喻那些无法直接揭露的宫中生活和贵族的横暴”。

以上通过分析具体作品考察了传统时代的韩国人如何认识“中国”这一他者,又如何将之融入于作品之中,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韩国人的思维和形象化的意义。本文可以说是一次尝试性研究,旨在阐明在东亚众多的文学分支中,韩国人所创作的韩国文学所占据的地位和所具有的特征。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作更多论述。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要想全面地把握韩国文学世界化这一问题,除了阐明韩国文学是如何被动地吸收和反映外部文化(中国)的同时也要阐明韩国文学是怎样主动地去影响和传播到外部文化的。这也是笔者今后要补充完成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1]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 韩国文集丛刊[M]. 首尔: 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出版, 1990.
- [2] 申纬. 申纬全集[M]. 首尔: 太学社, 1983.
- [3] 休得臣. 诗话丛林冬[M]. 首尔: 延世大学所藏写本.
- [4] 郑珉. 穆陵文坛和石洲权辨[J]. 首尔: 太学社, 2006.
- [5] 琴知雅. 申纬的绘画收藏和鉴赏眼[J]. 韩中人文, 2008, 23 辑.
- [6] 金万重. 九云梦[J]. 石轩丁奎福教授所藏老尊本, 首尔.

[责任编辑 赵 琴]

The Image of China in Korean Classic Literature

QIN Zhi-y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how Koreans recognized and described China in classic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s the meaning of the thoughts and images behind the descrip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identify and locate Korean classic literature on the diverse branches of 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the time of the Goryeo and Chosun dynasty, a notable number of Korean classic literature takes China as their background and topic. Some lyric poems and descriptive poems takes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and Chinese beautiful scenery as their theme. Some biographies and novels set in ancient China and mainly describe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many different routes, these Chinese features influenced ancient Korean literature. From envoys from China, the journals of ambassadors to China, Chinese books, and Chinese pictures that nobles owned, Korean authors could make their indirect journey to China. Though those classic Korean literature set in China and describe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ose descriptions on China actually conveys Korean culture, ideology, emotion, and destiny.

Key words: Korean Classic Literature; China; Korean author and 'China'; topic and background